

本刊的網絡版開通已八年，閱讀人次逾五十萬。這個網絡版幾經變化，近兩年定型為以刊載首發論文為主、配以印刷本已刊論文的網絡月刊。傳統印刷紙面刊物，因版面而限制了每期總字數，因郵寄而限制了流通。近幾年本刊來稿量大增，促使我們出版網絡月刊，使更多論文、特別是年輕學人的新作，能更快面世。另外，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刊在國內的流通受到限制，為了使更多讀者能看到本刊內容，我們決定將印刷版的文章，早一點、多一點放到網絡月刊上。歡迎各地讀者上網 [www.cuhk.edu.hk/ics/21c/](http://www.cuhk.edu.hk/ics/21c/) 閱讀。

——編者

## 歷史的細節誰來書寫？

每年開當代文學課，照例是要講余華小說的。每次都會為他對死亡描寫的細緻、冷靜和極端想像而心悸。然而王友琴的〈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那份六十三名死亡者的名錄列表，卻讓我感到極大震驚：極端性的藝術想像，在現實面前是何等的蒼白。

請看看吧：死者的身份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級知識份子、有一般工人市民；死亡的方式有服敵敵畏、自縊、被逼喝污水中毒、勞改致死、毆死、服毒、上吊、跳樓、投水、被亂槍刺死、牢獄至死、自刎、用刀片割斷股動脈、夫妻同服安眠藥自殺、臥軌、有病不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准治而死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中外歷史上，有哪一部作品能夠同時想像並列出如此多樣的死亡方法，而所有這六十三人的「非自然」死亡，只是因為「文革」中，他或她被指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的對象！

歷史關注的總是「大寫的數字」，至於究竟有多少無辜者輾死於「滾滾歷史車輪」之下，則往往不被計算。甚而言之，更有不少慘痛的人民之死，不是被演繹為文功武略的偉績，就是被略為歷史前進的代價。歷史的慘痛和真相，就這樣被忽略、被遺忘、被篡改。

想到二戰之後猶太人對納粹戰犯的不懈追捕，這不僅僅是報復，而是另一種「細節歷史」的書寫。而我們呢？我們連波及全國十年之久的「文革」都不能、不敢、不被允許認真追究！

這遠遠談不上完備的「個人文革死亡記錄」，還存在一個根本未被觸及的數字黑洞——究竟有多少人參與了對這六十三人的殺害呢？又有多少人，參與了全中國的「文革」瘋狂呢？歷史的細節誰來書寫？元凶之罪、自我之罪、民族之罪，何時得以真正清算？

姚新勇 廣州

2006.2.28

## 如何面對歷史？

魏格林的文章〈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提出了一個民族如何面對歷史問題，進而關涉到該民族的認同問題。

對歷史的反思與當代人的認同密切相關。歷史由是成為個人安身立命的一個根據，亦成為民族國家存續的「合道性」(legitimacy) 之重要來源。這個問題是普遍性的：俄羅斯人面對斯大林的歷史功過時，土耳其人面對亞美尼亞屠殺問題時，美國人談論南北戰爭史時，歷史成了讓人們發生分裂與衝突的記憶。更典型的例子是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妄圖篡改侵略歷史，淡化、美化其對亞洲鄰國造成的巨大歷史創傷。這些都證明日本人無法正視自己作為加害者的歷史，在這個問題上，日本人的分裂是非常明顯的。

魏格林極其重視道德標準：「道德記憶和對過去的反思不僅僅是處於對受害者而言，對民族重建認同也是極為必要的。」其實，對歷史的反思，道德只能是個必須堅持的底線。對過去之認識的「碎片化」現象，恰恰說明了歷史研究之不足，亦即基本史實的重

建仍然是迫切任務，時代仍期待「良史」。只有建立在牢固史實基礎上的道德才是堅實的。

管濤 北京  
2006.3.2

## 何謂「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

郭建的〈當代左派文化理論中的文革幽靈〉（《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一文中論及的阿爾圖塞、傑姆遜、德利克俱屬歐美著名知識左翼，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認同和闡釋「毛文革」及其內在合理性，並影響了90年代的中國新左。儘管他們的理論路數不一，側重不同，但在對文革的肯定上，都顯示出一種共同的精神癡候：「不計後果的大腦」。

用韋伯的區分，以政治為職志的人面對兩種倫理：意圖倫理（目的倫理）和責任倫理。郭文中的幾位顯然都是意圖倫理者。這種倫理的極致表現可以這樣表述：為了自己奉持的正義實現，哪怕世界毀滅。我的一位朋友講了他在美國親歷的一件事。他的朋友是專門研究文革的，面對美國左派對文革的辯護，他的朋友問對方可曾知道文革死了多少人，誰知對方竟反問：這關我甚麼事？是呀，中國死多少人，和他們有甚麼關係呢？和他們有關的只是他們心中的理念，而毛澤東正好以文革的方式踐履了他們的理念！

至於郭文中提到的中國新左，正忙於「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尋求中國現代性的不同路徑，而文革中的「大民主」，未必不是其方式之一。對此，我要問的是，甚麼不是現代性？希特勒是現代性、毛澤東是現

代性、金正日也是現代性。因此，全部問題在於選擇，基於「目的倫理」還是「責任倫理」的選擇。在前者的意義上，我對中國新左選擇北韓並不吃驚，同樣，對尚未出現但在邏輯上可能出現的中國新左對這一選擇的支持，也不表示吃驚。

邵建 南京  
2006.2.25

## 毛澤東理想藍圖的核心是平等

艾愷在〈文革：四十後的破曉〉（《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一文中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理想藍圖，即具有自力更生、民粹主義、唯意志論及反智主義等特點的毛主義。它表現為試圖用延安模式來改造國家，其本質是反現代主義的。筆者基本贊同他的這一觀點。

但艾愷把毛澤東理想藍圖的本質歸結為反現代主義，是把現象誤讀為本質。例如按照其引用的韋伯對現代化所作的理解，現代化就是專業水平的不斷提高。實際上，平等是毛澤東的最高價值追求，是其理想藍圖的核心，他對專業化的態度取決於專業化與平等之間的關係模式。如果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有利於推進平等，那麼專業化就是可取的，正如50年代中期毛澤東想通過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來推動平等時，他還是比較贊成專業化的。如果專業化水平提高反而是擴大不平等，如60年代後，他對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推動平等喪失信心，開始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政治領域後，專業化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作用被他棄之腦

後；他就必然要反專業化了。所以，反現代化只是毛為實現其平等理想的一種工具層面的東西，構不成毛主義的本質。

申林 北京  
2006.2.27

## 「中國和平崛起」並非僅僅限於經濟增長

筆者基本支持岳健勇對「中國和平崛起」問題的理性思考甚至憂慮（《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但筆者並不認為「中國和平崛起」僅僅限於一個經濟維度。在全球化趨勢業已不可逆轉的情形之下，中國如何在複雜多變的國別或地區政治經濟利益衝突關係體系中尋求崛起，顯然並非僅僅是一個尋求經濟增長持續的問題，而是必然涉及到別國或地區之間在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多個維度的衝突、競爭與融合。當然，一國的崛起，不免會引起別國的疑慮、戒心甚至恐懼。因此，尚陷在「去工業化」困局中的中國，必須對和平崛起的漸進之路甚至斷絕之路具備足夠的理性與策略。

另外，我們總是常常基於學術理性來分析與解讀「中國和平崛起」；但更應注意到政治理性和學術理性的差異，學術理性嚴格按照實然的標準進行分析與研究，而政治理性則往往具有很大程度的應然成分。就中國的發展戰略而言，「中國和平崛起」其實應是政治理性的結果。

嚴若森 武漢  
2006.3.3